

清代西藏的“阿里总管”体制

黄博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清代西藏地方政府设置“阿里总管”(噶尔本)一职,作为阿里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其历史可追溯到1680年前后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蒙藏联军收复古格旧地之际。早期的阿里总管带有强烈的军事管制性质。18世纪上半期,准噶尔问题突出,在清朝中央的关注与决策下,阿里总管的军事力量得到强化,其权力与地位在西藏政治中举足轻重,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后,新组建的噶厦政府为阿里地区最高军政事务的处理确立了双长官领导体制。而1760年代以后,随着准噶尔的平定与清朝中央注意力转移,阿里总管的实权和地位逐渐下降,至清末已不复当年了。

【关键词】阿里总管;噶尔本;清代;西藏

【中图分类号】 K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2020)04-0088-09

【收稿日期】 2019-10-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西藏阿里地区政治地理研究”(19FZSB061)

【作者简介】 黄博(1982—),男,重庆长寿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与文化。

清代西藏地方政府辖下的阿里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称为“噶尔本”(sgar dpon),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官名,本意是“营官”,即驻军长官。清代汉文文献通常把阿里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噶尔本称之为“阿里总管”。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西藏地方政府陆续在那曲、山南、塔工、亚东、昌都等地设置地区总管(基巧),而阿里总管则是清代西藏地方政府最早设置的地区总管。目前学界对“阿里总管”体制的历史尚无专文探讨^①。因此本文尝试对该总管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进行研究,以揭示其在清代西藏政区层级演进中的历史意义。

一 1727年前阿里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选任与轮替

阿里地区纳入清代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管治得力于“拉达克—卫藏战争”的胜利。早期阿里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带有较强的军事管制色彩。1680年前后率领卫藏的蒙藏军队收复古格

旧地的甘丹才旺(dgav ldan tshe dbang)已具有首任阿里总管的性质^②。只是甘丹才旺是以战后驻扎在阿里地区的蒙藏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兼管阿里军政事务。藏文史籍中通常称为“蒙古王子”,他很可能是固始汗的第六子多尔吉达赖洪台吉之子^③。他在任的时间不长,最迟不超过1687年。因为《五世达赖喇嘛续传》记载,当年西藏僧俗贵族在拉萨为他举行了超度仪式^④。不过甘丹才旺死后,阿里地区军政大权仍然控制在当

① 目前学界只对民国时期的昌都总管体制有较充分的考述,参见土呷:《“朵麦基巧”沿革考》,《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第161-170页。

② 陈庆英:《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第84页;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版),(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页;黄博:《试论清初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地区统治的建立》,《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144-145页。

③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④ [清]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续传》(藏文版),《五世达赖喇嘛全集》(藏文版),木刻本,cha函,第100叶。

时主政西藏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家族手中。

1715年9月到达阿里地区的意大利传教士德西迪利,正好听到了上一任阿里总管病死,新的阿里总管即将到任的消息:

从泽基康(Tashigong)动身旅行两天以后,到了一个叫作嘎多阿(Cartoa)的地区,这个地方很大,由一队力量很强的鞑靼军队和西藏军队共同守备,他们都属于中藏的藏王,不但要保卫泽基康和各个村庄,而且要防备一些武装土匪从无人知晓的小路逼近,侵略这个地区。这些军队的指挥是一位鞑靼王子,由于他两年前死去,所以他的夫人就代行指挥的职责。这位王后现在得到命令,要她将手下的士兵归还拉萨,守备的事务由新的军队代替,由另外一位指挥官负责。^①

泽基康即今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的扎西岗(bkra shis sgang),嘎多阿则是指阿里总管的驻地噶大克(sgar thog,今噶尔县噶尔亚沙仲措),两地相距约120公里。从德西迪利的描述可知,直到18世纪初,阿里仍由蒙藏联军驻守,其统帅仍然是蒙古王子。这个蒙古王子应该是甘丹才旺的继任者,约病逝于1713年。德西迪利的这段描述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西藏地方政府对阿里地区驻军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很可能召回了原来驻防的部队,重新派出了一支新的部队换防阿里,这位新的指挥官可能就是著名的康济鼐^②。据《颇罗鼐传》记载,1717年准噶尔人经阿里突袭拉藏汗时,正是阿里总管康济鼐向拉藏汗报告了准噶尔军队的情况^③。约半个世纪后编成的《西域同文志》著录其头衔,已经是后世阿里总管的正式称号——“噶尔本”(sgar dpon)^④。

康济鼐作为第一个西藏贵族出身的阿里总管,意味着和硕特蒙古汗王家族主导的军事管制体制的结束。阿里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驻有蒙藏精锐部队,成为影响西藏政局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军政力量。在准噶尔军队占领拉萨期间,康济鼐则凭借阿里地区的军事实力与准噶尔军队相抗,引起了清朝中央对阿里地区的注意。《清实录》记载:“阿里地方之第巴康济鼐与准噶尔为仇。截夺准噶尔之人。又截夺准噶尔兵回路。”^⑤清军平定入藏的准噶尔军队后,康济鼐还因此受到嘉奖。1721年清朝中央改组西藏地方政府后,康济鼐获封贝子,出任首席噶伦,主持西藏地方政府

工作。

获封首席噶伦后的康济鼐仍然兼管阿里事务,并没有长驻拉萨,因此经常奔波于两地之间。据《颇罗鼐传》记载,雍正皇帝即位后,“就在那时,文殊皇帝有旨:命康济鼐去阿里地区。那一带的那仓、萨噶等地,因疑为准噶尔贼军出没之处,故命严加防范,勤于巡查。得到圣旨,康济鼐赓即驱骑登程”^⑥。但稍后罗卜藏丹津叛乱,“这时身为西藏首领的噶伦们,十分惊恐。一月之内,就往阿里派了七次专使,敦促康济鼐速来”^⑦。可见这一时期康济鼐因为要兼管阿里事务而不能专驻拉萨。拉萨与阿里之间相距遥远,交通条件又非常恶劣,这样两处行走的办法,在实际运作上颇为困难。雍正帝即位后曾反复思考阿里总管的选任问题,雍正元年(1723)的谕旨中提出一个变通办法,设置一个类似“副总管”的职位,协助康济鼐主持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

阿里地方,甚属紧要。今康济鼐亲身赴藏同隆布奈等料理藏地,其阿里地方无人办事,应交康济鼐派出效力之人奏闻,赏与职衔,协助防守。^⑧

这大概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方案,在康济鼐被清朝中央选定主持西藏地方政府工作后,事实上已无精力兼管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雍正三年(1725),在清朝中央推动下,康济鼐提出了新任阿里总管的人选:

王大臣等奏阿里形胜地,康济鼐即驻

① [意]依波利多·德西迪利撰,[意]菲利普·费拉比编,杨民译:《德西迪利西藏纪行》,(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② 毕达克(Luciano Petech)推测康济鼐大约是在1715年底或1716年初被拉藏汗任命为阿里总管。参见[意]毕达克著,沈卫荣等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③ [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④ [清]傅恒:《钦定西域同文志》卷24《西番人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2页。

⑤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

⑥ [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第211页。

⑦ [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第216页。

⑧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278页。

藏,请令择代理阿里事务者,康济鼐遵旨议以其兄喀锡鼐色布登喇什为阿里总管。^①

喀锡鼐色布登喇什即藏文文献中的噶锡哇·才旦扎西(dgav bzhi ba tshe brtan bkra shis)。康济鼐的崛起依靠的是阿里总管的军政实力,他到拉萨后能不能镇服当地势力,雍正帝本人其实相当犹疑:“今令康济鼐为总领,带领伊属下唐古特往居西藏,阿尔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济鼐孤身在彼,虽欲效忠,势必不能”^②。雍正帝的担忧在两年后变成现实,离开阿里后的康济鼐,于1727年在拉萨被阿尔布巴等卫藏贵族杀害。随后康济鼐的部下颇罗鼐在后藏起兵平叛,卫藏战争爆发。战争期间,阿里总管仍然是西藏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颇罗鼐积极争取时任阿里总管噶锡哇的支持,作为康济鼐的兄长,噶锡哇积极参与了颇罗鼐领导的平叛战争,为防备准噶尔人趁机入侵,他分出部分军队留守噶大克和日土,然后率领阿里驻军中的精锐骑兵2000人到后藏,与颇罗鼐会师后继续进兵,不幸在随后的江喀战役中激战身亡^③。但在阿里和后藏联军的支持下,1728年颇罗鼐终于歼灭叛军,攻入拉萨。随后获得清朝中央的封授,总理前后藏事务,西藏地方政府进入颇罗鼐领导的郡王体制时期。

二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与阿里地区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终结

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后,便让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vgyur med tshe brtan)总管阿里事务。鉴于阿里地区在边防上的重要性,清朝中央继续对阿里总管的人事安排保持高度关注。1730年清朝中央接到准噶尔意图骚扰阿里边境的情报,即令珠尔默特策布登率阿里地区驻防部队到边境巡视,“以颇罗鼐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防准噶尔贼,保唐古特”。随后因防御准噶尔有功晋封辅国公^④。此后珠尔默特策布登被称为“阿里公”,阿里地区事实上成为他的封地。不过史料显示,颇罗鼐时代,珠尔默特策布登本人实际长期在拉萨“养病”,没能真正前往阿里主持工作。直到1747年4月颇罗鼐病死后,在驻藏大臣傅清的支持下,珠尔默特策布登才真正掌握了阿里地区的军政大权:

驻藏副都统傅清奏:“从前阿里克地方原系颇罗鼐长子公珠尔默特策布登驻扎管

辖,嗣因足疾回藏调养。兹颇罗鼐病故,阿里克地方紧要,伊足疾渐愈,臣即令仍赴阿里克防范。”^⑤

据驻藏大臣傅清奏报,“其防守阿里克一路,已令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前往,带兵五千驻扎”^⑥。清朝中央与驻藏大臣之所以在颇罗鼐死后有意强化阿里总管的实力,除了确因准噶尔的威胁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与他们对新继任的总理藏政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骄横专权并无好感有关。扶持珠尔默特策布登总管阿里事务,加强阿里总管的军事力量,希望以此牵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继任后,试图进一步强化其权力,视坐拥重兵、镇守阿里的长兄珠尔默特策布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矛盾激化,1749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兄弟相争的最初阶段,《清实录》有详细的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据纪山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告知,伊兄珠尔默特策布登与伊素不相合。阿里克喇嘛寺中谛巴果弼奈乃伊所补放,珠尔默特策布登欲加残害,并抢夺买卖人货物,用兵把守通藏要路,声言欲来西藏。果弼奈遣人间道告急,禀知达赖喇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面调兵防护果弼奈,一面奏闻请旨”等语。^⑦

为了除掉镇守阿里的珠尔默特策布登,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首先派出亲信“谛巴果弼奈”到阿里插手寺院事务,引起珠尔默特策布登的不满,双方可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趁机向驻藏大臣报告珠尔默特策布登起兵作乱,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派兵平乱,借以消除异己。对于二人的争斗,清朝中央虽然要求驻藏官员采取不动声色的立场,但乾

① [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7《西藏部》,刘长海整理:《祁韵士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380-381页。

②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303页。

③ [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汤池安译:《颇罗鼐传》,第261—280页。

④ [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7《西藏部》,第382—383页。

⑤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606页。

⑥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625页。

⑦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07页。

隆帝和驻藏大臣对其中的隐情却相当清楚。乾隆帝的谕旨要求驻藏官员不可听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一面之词就授权他以平叛的名义出兵阿里,谕旨中乾隆帝对二人的偏好非常明显:

朕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向日并无蠢动端倪,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人暴戾,全不似伊父颇罗鼐之恭顺安静。安知不因其素与伊兄不睦,思欲构衅兴兵,以陷害其兄,捏造果弼柰告词,以耸动纪山及达赖喇嘛。纪山等亦孰从而辨之?今已传谕傅清、纪山,令其镇静。勿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所愚。^①

乾隆帝及驻藏官员大多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起兵,可能出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虚报。不过,实情可能是,拥有重兵、坐镇阿里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求自保,确有起兵之举。此前康济鼐和颇罗鼐在受到卫藏贵族势力压迫时都有依靠阿里驻军扭转局势的先例。但不论清朝中央是否支持,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也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消灭异己的机会,必定出兵进攻阿里,因此双方军队确实发生过战斗。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报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曾率领一支700人的军队攻取了锡可尔城^②。《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则明确提到“郡王达赖鼐与阿里公不和,战事扩大”^③。正当双方的争夺陷入白热化时,当年年底,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竟然死了,驻藏大臣纪山的报告称他死于1749年12月。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暴卒,清朝方面的情报认为是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派人暗杀,而对外则谎报病死^④。

1749年阿里总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总理藏政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兄弟之争,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即使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死,要想依靠阿里地区的驻防兵力入主拉萨,似乎也是不可能的。此时的力量对比已与康济鼐、颇罗鼐时期大不相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控制前后藏,并有清朝中央授予的总理藏政的郡王地位,强弱悬殊分明。这一点清朝中央早已洞悉,事变初起之时,乾隆帝就担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众寡不敌,势必为伊弟所戕”^⑤。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死后,阿里总管一职出缺。清朝驻藏官员担心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以素所亲信管阿里克地方,归并其权,以增羽翼”,倾向于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二子中择一人承袭阿里总管之职。但这一建议遭到乾隆帝的驳斥。显然,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死后,阿里总管已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囊中之物,要阻止他夺

得阿里总管的人事权,清朝中央必须“劳师动众”才能办得到,而乾隆帝认为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⑥。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最后选派了自己的儿子达尔扎策凌(dar rgyal tshe ring)镇守阿里,1750年3月,驻藏大臣纪山向乾隆帝奏报,“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请将伊子达尔扎策凌遣往阿里克地方驻守”,乾隆帝批准了这一任命,因“达尔扎策凌现系闲散,并无官职,若往阿里克地方管辖兵丁,不足以资弹压”,还特地晋封他为扎萨克头等台吉^⑦。不过,达尔扎策凌其时年幼,且半年之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即遭诛杀,达尔扎策凌应该未及赴任^⑧。随后,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对阿里总管的领导体制也做出了重大调整。

三 噶厦时期阿里双长官领导体制的确立及其权位的衰落

1750年11月,清朝中央宣布为前阿里总管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恢复名誉,并打算让暂时主持藏政的多仁班智达安排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gyur med dbang rgyal)接掌新的阿里总管一职,朝廷谕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本无罪之人,抱屈被害,应为昭雪。著班第查明伊子,传谕朕旨,复给以公爵,令管辖阿里克地方番众,黽勉效力”^⑨。然而1751年正月,多仁班智达却向清朝中央奏报珠尔默特旺扎勒为人平常,恐贻误地方,因此乾隆帝只得下诏让珠尔默特旺扎勒仅承袭其父留下的爵位,而让驻藏大臣和新组建的噶厦政府重新拟定阿里总管人选^⑩。其间七世达赖

①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08页。

②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24页。

③ [清]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④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66-1167页。

⑤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08页。

⑥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30-1131页。

⑦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37页。

⑧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90页。

⑨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69-1170页。

⑩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186页。

也参与了阿里总管的选任,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有如下记录:

兹达赖喇嘛差卓呢尔告称,阿里地方甚属紧要,向系喋巴二人。自珠尔默特那木扎尔被诛后,新放之喋巴吉都鼐,人去得,可信,无庸更换。惟旧有之郭必奈,人甚不妥,应亟调回。已选得说冈奈一名,人明白妥协,诚实可信,若放以喋巴前往,与吉都鼐公同镇守其地,甚属有益。^①

郭必奈即前面提到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亲信果弼奈,此时他当然是不合时宜的了。集都鼐即《西域同文志》中记载的吉多鼐·索纳喷磋(skyid stod nas bsod nams phun tshogs)^②。另据《七世达赖传》记载,1751年有一名叫作琼结雪康巴的人也被任命为堆噶尔本^③,此人在《西域同文志》中写作硕康鼐策旺(zhol khang nas tshe dbang)^④,也就是上面这份奏折中所说的“说冈奈”。集都鼐与说冈奈“公同镇守”阿里,标志着阿里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终结。事实上,阿里总管的双长官体制,可以追溯到颇罗鼐时期。据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描述,1734年左右,因珠尔默特策布登回拉萨养病,颇罗鼐向清朝中央奏报,“公珠尔默特策布登从阿里至此,其缺由青特古斯、图尔根哈布哈二人替补”^⑤,青特古斯、图尔根哈布哈二人实际上代替珠尔默特策布登主持阿里的军政事务,也即前揭材料中所说的“向系喋巴二人”的由来。

集都鼐与说冈奈二人,属卫藏地区普通贵族,生平事迹并不突出,无法与18世纪前半期以来的康济鼐、噶锡哇、珠尔默特策布登来等人相比。不过,噶厦时期的最初十多年间,阿里总管的出身虽然比起以前有所下降,但在整个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官僚队伍系统中,其地位仍然不低。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1751年颁布)的第十二条中,还专门规定了阿里总管的选任报备制度:

阿里、那曲等地甚关紧要,查那曲联接青海,阿里与准噶尔接壤,派往该地之头目,应拣选根基深厚,素有名望之人,应请达赖喇嘛选择派遣,所派之人员名单,应报部奏恳圣恩,赏给号纸,以利防范边卡。^⑥

清朝中央对阿里总管的人选相当重视,建立起阿里总管须报中央备案的制度。这些报清代

中央备案的阿里总管共有六人记录在《西域同文志》中,其中就包括了前噶厦时代的第一任阿里总管集都鼐(吉多鼐·索纳喷磋)与说冈奈(硕康鼐策旺)^⑦。但随着1760年代以后准噶尔问题的解决,清朝中央对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就渐渐失去了兴趣。1762年正月,清朝中央认为此时“准噶尔、叶尔羌等俱蒙德化,安享太平”,决定将设置在阿里北部边境噶托克(日土)境内的台站裁撤,该地防务交本处第巴、头目每年派人巡察,中央不再负责^⑧。大约此后,阿里地区基本上不再驻守重兵,阿里总管也失去了昔年手握重兵、坐镇方面的地位。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阿里总管的人选便不再被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所重视,此后再也没有足以影响西藏政局的高级贵族担任阿里总管了。从此以后,阿里总管的选任与轮替在藏、汉文史料中都难觅踪影^⑨。

阿里总管地位的下降,跟阿里地区军事力量的衰落密切相关。随着准噶尔威胁的解除,阿里的边防压力顿减,清朝中央也对阿里事务失去兴趣。与1751年的“十三条”相比,在1793年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就完全没有提

① 《策楞等奏派人管理阿里地方折》,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849页。

② [清]傅恒:《钦定西域同文志》卷24《西番人名》,第427页。

③ [清]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第290页。

④ [清]傅恒:《钦定西域同文志》卷24《西番人名》,第427页。

⑤ 《颇罗鼐奏派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驻守阿里折》,张羽新:《清朝治藏典章研究》,第837页。

⑥ 王玉平等:《藏文历史资料译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4年,第121页。

⑦ 此六人为:硕康鼐策旺(zhol khang nas tshe dbang)、斋春巴藏博扎什(bkras shongs pa bzang po bkra shis)、吉多鼐索纳喷磋(skyid stod nas bsod nams phun tshogs)、布鲁巴噶藏(brum pa skal bzang)、沙将丹增(shag byang bstan vdzin)、囊科瓦居默特(nang vkhor ba vgyur med)。参见傅恒:《钦定西域同文志》卷24《西番人名二》,第427-428页。

⑧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299页。

⑨ 当然,仔细寻绎还是可以发现18世纪后半期的一些阿里总管的活动记录,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比如《八世达赖喇嘛传》中出现过两个阿里总管,分别是1783年4月阿里总管(堆噶尔本)东那哇请僧人为达赖喇嘛作祈寿法会;1786年前堆噶尔本米日加巴为八世达赖诵经祝寿。参见第穆呼图克图·洛桑图丹晋麦嘉措著,冯智译:《八世达赖喇嘛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24、149页。

四 阿里总管驻地的选址及其季节性变换

及有关阿里的安排。在章程规定的西藏驻军配额中,整个西藏编制正规军3000人,前、后藏各驻1000人,江孜、定日各驻500人^①。与18世纪前期阿里地区常有数千名精兵驻防不同,18世纪末的这次边防安排,阿里地区已无正规军驻守。

此后阿里总管已经不再拥有一支像样的常备军,遇有战事只能临时征集士兵。1825年英印当局的库马翁行政专员(Commissioner of Kumaon)特雷尔(Trails)曾在报告中说:“这个地区唯一正式的军队由200名骑兵组成,驻守在噶大克。士兵最初是从鞑靼人中招募,他们被不丹人称为马食种人。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登记在册的民兵,在需要之时可以很容易地召集起来。”^②正是因为阿里总管军事实力的衰落,1841—1842年森巴战争期间,道格拉人攻入阿里后,才能一路势如破竹。战争前期,由于阿里地区长期军备废弛,敌军入境后在四个月内迅速攻占了阿里全境大部分地方。森巴战争后噶厦政府一度规定在阿里首府噶大克驻守藏军500名,下属的扎布让宗和日土宗各驻守200人^③。但这些安排在战后可能并没有常态化,清末进入阿里地区的英国殖民者观察,当时噶大克已没有正规军驻守,并且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④。

另一方面,森巴战争前后阿里总管的双长官体制最终稳定下来,据旧噶厦政府的工作人员回忆,阿里总管由地方政府派遣的外四品俗官担任。藏历第十四绕迥木羊年(1835),确立了给予两名五品俗官以“外台吉”的地位,令其分别担任东西“噶尔本”(营官)的制度。按例他们原本的五品职衔,到了阿里后可以享受四品官的待遇和仪仗^⑤。但清代后期阿里总管在西藏政治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卫藏贵族大多不愿亲自到任,渐渐出现了所谓的噶尔本代理人。清末英国殖民者在阿里活动期间,当时真正的下噶尔本实际上并未到任,六年来都是他的二十四岁的儿子在噶大克代理他的职权^⑥。出任阿里总管的卫藏贵族本人不到任,而派亲信代理的情况,在民国以后基本已成常态。如1916年冈底斯山山洪暴发,署名上报灾情的是堆噶尔本囊噶之代理^⑦。20世纪30年代出任阿里总管的姜健色·索南杰波(bsod nams rgyal po),也没有亲自赴任,而是让他的姐姐德炯旺姆和姐夫为代理人常驻阿里^⑧。

清代以来的各种文献都显示,阿里总管的驻地为噶大克(sgar thog),且其历史应该相当悠久。前引德西迪利的说法,1715年时噶大克就已经是阿里总管所统蒙藏联军的驻地^⑨。这里可能就是1680年前后甘丹才旺率军收复古格故地后的驻军之所,噶大克的“噶”(sgar)本意就是兵营、营地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西藏地方政府收复古格故地后,并没有选择原来的古格首都扎布让为阿里总管的驻地,尽管那里还有著名的古格王城可资利用。事实上清代西藏各级军政机构的治所多以城堡为主,阿里总管下属的各宗宗本的治所都是筑城聚居,最有名的是普兰宗堡“布拉木达克喇城”(spu rang sdag la mkhar,意为“虎碉”),建筑在城区东边的山顶上,为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物^⑩。所以阿里总管的驻地不是西藏常见的“城堡”(mkhar)而是“营地”(sgar),就显得尤其特殊。

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甘丹才旺作为蒙古王子,与他统领的蒙古骑兵们,恐怕并不习惯住在

① 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② Charles A. Sherring, *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The Sacred Country of Hindus and Buddhists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overnment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Its People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6, p151.

③ 详情可参见伍昆明:《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年,第151—162页。

④ Charles A. Sherring, *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 pp.151—152.

⑤ 夏札·甘曲班觉等编,计明南加译:《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机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3)》,(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⑥ Charles A. Sherring, *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 pp.306—307.

⑦ 西藏历史档案馆等:《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灾异志水灾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⑧ [意]毕达克著,沈卫荣等译:《西藏的贵族和政府(1728—1959)》,第211页;廖东凡:《拉萨掌故》,(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30—332页。

⑨ [意]依波利多·德西迪利撰,[意]菲利普·费拉比编,杨民译:《德西迪利西藏纪行》,第44页。

⑩ 黄博:《清代西藏阿里地区城镇形态及其发展略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02页。

“城”里。据说早期阿里总管更喜欢按照蒙古人的风俗搭建帐篷办公,因此当地人也把阿里噶尔本政府称为“帐篷政府”(sgar dbu gur)^①。古格时代阿里地区的政治重心在朗钦藏布(象泉河)流域。这一带曾经有着相当发达的河谷农业,古格王室也喜欢筑城聚居,早期都城东嘎(dung dkar)和晚期都城扎布让(rtsa hreng)皆建有相当规模的城堡,而在今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和普兰县境内更是遍布着古格时代的城堡遗迹^②。但清代阿里总管的的活动重心移至森格藏布(狮泉河)流域,这一区域的海拔多在4500米以上,大多是牧区或半农半牧区,传统的筑城聚居模式并不合适。

另一方面,噶尔藏布夹在阿伊拉日居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形成了一条天然的西北—东南通道,使得噶大克拥有了优越的区位优势,从而成为拉达克至拉萨交通干线上的关键节点(见图1)。清代拉达克年贡使团前往拉萨的路线,就是从拉达克首府列城(Leh)出发到典角(bde mchog),再经扎西岗到噶大克,期间大约需要五天;然后从噶大克出发到玛旁雍措湖北岸的

巴嘎(bar ga),再向东翻过马攸木山口(ma yum la)即可达日喀则和拉萨^③。显然,选址噶大克为阿里总管驻地,更有利于阻击拉达克的反攻,也更方便得到卫藏地区的支援。这一思路也体现在战后甘丹才旺的其他一些安排上,例如他曾让其部将把一些游牧于藏北纳木措(gnam mtsho)的蒙古人编为一个翼(ru),安置在噶尔藏布左岸、距噶大克30多公里的那木如(gnam ru),显然也是为了巩固这一交通线^④。

噶大克虽然以阿里总管驻地而知名,但却不是阿里总管的唯一驻地。噶大克的地理环境除了交通条件优越外,其他的因素,无论是海拔、气候还是植被条件都相当恶劣。1904年到访噶大克的英国人查尔斯·谢林(Charles A. Sherring)说因为这里海拔高达15100英尺(4600米),所以冬天非常冷,只能作为阿里总管的夏季驻地,一到冬天噶大克的居民和阿里官员都会整体迁移到距噶大克约两、三天路程的噶尔昆沙(两地相距60多公里)——位于噶大克以北噶尔塘楚(即噶尔藏布)河畔。跟噶大克比起来,噶尔昆沙还有很多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建筑^⑤。噶尔昆沙(sgar dgun sa)的“昆”(dgun)在藏语中即冬季之意,这一带水草较为丰富,气候也较暖和,所以成为噶尔本的冬季驻地。而噶大克又称噶尔亚沙(sgar dbyar sa)，“亚”(dbyar)即藏语夏季的意思^⑥。所以,准确地说阿里总管有两个驻地,分别是夏季驻地噶大克(噶尔亚沙)和冬季驻地噶尔昆沙(见图1)。

因为阿里总管的驻地存在着季节性的变换,加上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以致所谓阿里首府噶大克的面貌看上去非常不像一个城镇。阿里总管被称为“帐篷政府”,而噶大克也是著名的“帐



图1 阿里总管驻地示意图

(底图来源:《西藏自治区地图册》“阿里地区噶尔县札达县地图”,(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① 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版),第68页。

② 黄博:《古格时期西藏阿里地区的重要城堡与村镇略考》,[奥]恭特朗·哈佐德、沈卫荣:《西藏宗谱:纪念古格·次仁加布藏学研究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年,第637-647页。

③ Janet Rizivi. *Trans-Himalayan Caravans: Merchant Princes and Peasant Traders in Ladak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3-34.

④ 阿里地区政协:《阿里历史宝典》(藏文版),(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8-220页。

⑤ Charles A. Sherring. *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 pp.146-152

⑥ 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版),第68页。

篷城”。1812年英国人穆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曾到访过噶大克,他后来回忆说:“噶大克本身不过是一个由一些小型的白色帐篷,和几间看来跟拉达克的房子差不多的,用未经烧制的土坯砖搭建的房子所组成的野外营地。”^①这是清代中后期噶大克的情况,所以清朝官修地方志一度没有发现这个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了包括普兰的布拉木达克喇城、喀尔多木城以及古格的扎什鲁木布城、冲龙城等在内的阿里诸城,却没有提到噶大克^②。直至清末谢林还说噶大克只有几间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建筑,大部分人还是住在帐篷里^③。1908年入藏参与测绘工作的清朝官员陶思曾也说噶大克“地无屋宇,均支帐篷以居”^④。尽管城市面貌不怎么样,但噶大克却是清代整个阿里地区发展最快的城镇。当初因为军事原因选址这里,看中的是其位于交通干线上的区位优势。而当阿里总管的军事地位衰落后,噶大克的交通优势在商业上的作用又得到了发挥,从18世纪后期开始,渐渐成为西藏西部和西喜马拉雅地区最重要的商贸中心^⑤。

五 结 语

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在统一阿里地区之初,即将卫藏地区的宗谿制引进阿里,设置了以日土宗、普兰宗、扎布让宗和达巴宗为代表的一级基层政权,同时宗也成为阿里地区最基本的政区单位^⑥。“宗”(rdzong)在藏语中的本意为“城堡”,但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级政区,基本上相当于内地的“县”(现代藏语仍以“rdzong”对译汉语的县),各宗直接受清代西藏地方政府领导,有清一代西藏地方政府先后设置了五十多个宗^⑦。但各宗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缺乏一个类似于清代的府以及今天的地级市、地区行署那样的“统县政区”^⑧。这样的统县政区在西藏的表现形式——基巧总管区(spyi khyab,藏语意为“总管”)的全面设置是很晚的事情,基本上都出现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⑨。可以说整个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地方政府只在阿里地区发展出了统县政区的建置。但阿里总管在名称上与后来出现的其他地区总管不同,其称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管”,而是本意为“营官”、“驻军长官”的“噶尔本”。其原因就在于阿里总管的设置起源于17世纪晚期西藏

地方政府击败拉达克收复古格故地之际。由于是新收复地区又处于边防前线,必须在这里配置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所以阿里总管区在早期乃是为了应军事行动需要而设置的军管型特殊政区。这也导致了阿里总管在清代前期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因而18世纪上半期,历任阿里总管都深度参与了清代中央对西藏地方政治格局的形塑过程。

另一方面,阿里总管体制本身也是观察清代中央政府有效管治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侧面。清代中央政府通过西藏地方政府实现对阿里地区的有效治理,清代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一度建立起阿里总管的选任报备制度。虽然清朝中央一般是通过西藏地方政府来实施对阿里地区的管理,并不直接指导阿里地区的具体政务,只有在一些非常时期才会出面直接处理阿里地区的事务。但阿里总管体制的发展演变事实上却是在清代中央治藏过程中形成的。1760年

① Horace Hayman Wilson. *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 in Ladakh and Kashmir, in Peshawar, Kabul, Kunduz, and Bokhara By Mr. William Moorcroft and Mr. George Trebeck, From 1819 To 1825, vol. 1.*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41, p363.

② [清]潘锡恩:《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4页。

③ Charles A. Sherring. *Western Tibet and The British Borderland*, p147.

④ [清]陶思曾:《藏轺随记》,吴丰培:《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77页。

⑤ 黄博:《清代西藏阿里地区城镇形态及其发展略论》,第101-103页。

⑥ 关于清代阿里地区的基层政权和政区的建置情况,参见黄博:《四宗六本:甘丹颇章时期西藏阿里基层政权初探》,《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第148页。

⑦ 喜饶尼玛、王维强:《西藏通史》(清代卷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671页。

⑧ 关于统县政区的界定,参见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2001年第3期,第32页。

⑨ 其中除山南基巧(山南总管)始置于1909年以外,其他几个基巧都是在民国初年设立的,如朵麦基巧(昌都总管)始置于1913年,绛基基巧(黑河总管)始置于1916年。参见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原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机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73-282页;孙宏年、倪邦贵:《西藏基层政权建设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以前阿里总管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尊崇的政治地位,跟清朝中央对阿里总管人选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当准噶尔问题解决后,随着清朝中央注

意力的转移,阿里总管的实力和地位便迅速下降。阿里总管体制的强化和衰落,反映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政府内部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影响。

A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Tibetan Mngav-ris Governor in Qing Dynasty

Huang Bo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The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set up the position of Mngav-ris Governor(sgar dpon) as the highes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fficial in the Mngav-ris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ts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around 1680, while the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dispatched the coalition forces of Mongolia and Tibet to resume the place of former Guge Kingdom. Therefore, the early position of Mngav-ris Governor obviously looked like an military commander.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Junggar's threat to the Tibet caus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to pay attention to military deployment in this area. Under the attention and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Governor was strengthened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ibetan politics. Therefore, this posi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ll forces. In 1750, the Kasha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dual-headed leadership system in the handling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in this region. After the 1760s,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ungga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was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this region. From then on, the real power and status of the governor began to decline. By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power and status of the governor could no longer be comparable to those years in the past.

Key words: Mngav-ris Governor; Sgar dpon; Qing Dynasty; Tibet

上接第50页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en li and one gate" of Wang Jing's Governing Yellow River

Li Haolin

(The School of the Geo-Science & Techn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There are still disput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bout the form of "ten li and one gate" of Wang Jing's governing Yellow River and whether they were located on the Bian Channel or on the Yellow River.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ata for similar water resources, it can be proved that the water gate of Wang Jing was constructed on the Yellow River section rather than on the Bian Channel, that the water gate was a diversion outlet rather than a weir, and that the effect of flood diversion was achieved by the cooperation of the water gate and the weir. On this ba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Wang Jing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e three strategies of Jia Jean's River management, and put into practice the idea of Jia Jean's water diversion from the Yellow River to irrigate Hebei paddy fields and improve land fertility.

Key Words: Wang Jing; Bian Channel; Water gate; Three strategies of River management